

2020

數位化時代社交形式和具身性概念的可能變化

**Potential and Actual Changes of Social Activity and of the
Concept of Embodiment in the Age of Digitalization**

Xiaoxi Wu
Southeast University, Chin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repository.hkbu.edu.hk/ijccpm>



Part of the [Applied Ethics Commons](#), and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ommons](#)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中外醫學哲學》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repository@hkbu.edu.hk.

數位化時代社交形式和 具身性概念的可能變化

Potential and Actual Changes of Social Activity and of the Concept of Embodiment in the Age of Digitalization

武小西

Wu Xiaoxi

Abstract

Professor Hans-Martin Sass highlight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COVID-19 situation: the virus not only hurts people, but also attack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 He argues primarily on the level of basic ontology, revolving around two claims: first, that life is

武小西，東南大學哲學與科學系講師，中國南京，郵編：211189。
Wu Xiaoxi, Lecturer, The Humanities Colleg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1189.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年)：頁 69-7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69-73.

interconnected, and second, that long-lasting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 despite their similarities to natural organisms, are more receptive to transformation and modification. In my comments, I further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second clai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VID-19. I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embodiment and show that the way embodiment figures in our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and in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changes as more and more online social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Most importantly, I reflect on the very meaning of embodiment in the age of high bio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mely how the concept might be enlarged and/or transformed.

新冠疫情期間，防疫和經濟之間構成一對張力：防疫要求人們盡可能在家、保持社交隔離和實踐社交距離，但這極大影響了經濟運轉，導致大量店鋪關門、企業虧損甚至倒閉，並因此威脅到社會安定。正如薩斯教授的文章標題所言，新冠病毒不僅攻擊自然人，還攻擊政治和企業體。薩斯教授切入問題的視角非常獨特，既不是從經濟計量的角度，也不是從倫理兩難的角度，而是在基礎存在論層面，指出生命和生活的彼此關聯和相互依賴，並把包含了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社會整體看作一個生命體，考察新冠病毒對這個與生命體相似的社會整體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儘管標題是“冠狀病毒不但襲擊個體，還襲擊政體與團體”，薩斯教授的文章更多關注的是社會整體作為一個生命體的結構和特性。正文中明確提到“新冠病毒”並進行分析的地方似乎只有一處，即討論現代世界中對政治和企業體構成威脅的幾種可能方式，第一種即包括新冠病毒在內的全球流行病和生化戰爭（Sass 2020, 107-108）。把流行病和生化戰爭並置討論，是因為薩斯教授認為傳染性病毒有可能被武器化，並列舉了歷史上一些使用傳染病毒攻擊敵方的案例。而新冠病毒潛伏期很長，倘若恐怖分子把已感染人群用作武器，則很難被敵方輕易辨識。這或許解釋了薩斯教授的文章標題為何使用了“襲擊”這個對抗色彩格外明顯的概念。

但是，倘若我們跟隨薩斯教授的文章主線，便可以對新冠病毒的武器化使用這一可能性進行更深入的考慮和批評。不難發現，薩斯教授列舉的使用傳染性病毒作為武器的幾則案例，均發生於西元前 1000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時交通不便利，世界各部分——尤其是戰爭雙方——大體處於隔絕狀態，向敵方投射病毒並造成傳播，很可能並不會對自身造成麻煩。但我們已進入全球化時代，世界範圍內的人口流動非常頻繁，某種易傳染病毒在一個國家擴散開來，便意味著將在全球瀰漫，成為全球流行病。換言之，資本、訊息、文化和人力在全球範圍內的流通，更加顯著地體現出薩斯教授所強調的人類生活的相互依賴和一體化境況。在這種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緊密連接和互通的情況下，使用傳染性病毒作為攻擊敵人的武器，已經很難成為哪怕是恐怖分子的選項。面對全球流行病的爆發局面，我們更多應該考慮的，似乎不是生化戰爭的危險性，而是如何聯合各國人民共同抗疫，共同面對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健康、經濟和社會問題。新冠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並不是一部分人用來攻擊另一部分人的可能武器。

薩斯教授把政治和企業等社會性實體和自然人做了類比，認為兩者都是內在元素彼此關聯和相互依賴而構成的生命整體，但社會性實體與自然人作為生命體的一個重要不同點，便在於社會性實體的內在結構相對鬆散，其可調整空間更大，可以根據內部結構或元素的變化而進行靈活多樣的轉化和修正。（Sass 2020，106）筆者希望跟隨這條思路，探討新冠防疫時期社會生活的組織形式所發生的轉變，聚焦於具身性（embodiment）在人際交往中的必要性，分析社交隔離對具身性概念本身會有怎樣的拓展和轉化。

具身性概念與人的社會屬性密切相關。身體讓人處於時空之中，而時空總是自我與他人共用的社會性場域。因此，人作為具身性存在，總是生活在與他人的交道和往來之中，而人際往來又

構成著自我理解和自我建構的重要維度。通常的人際交往以具身性為基礎，人們見面擁抱、相聚飲食、上課、研討、商談、出遊或共同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疫情期間的社交隔離中斷了這種習以為常的具身性交往方式，人們以視頻或語音通話進行替代。現象學家馬修·拉克里夫（Matthew Ratcliffe）發表於《Lancet》雜誌的反思社交距離的短文便以這樣的對話開篇：作者詢問自己七歲的兒子是否願意和小夥伴線上聊天，他兒子憤怒地回答，不！如果不能觸碰到他們，為什麼還要說話。這個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把捉到了非義務性人際交往的具身性要素——人們渴望全息的、多模態的面對面互動。拉克里夫認為社交隔離打破了生活的質地，具有破壞性作用。並不只是因為新的“線上”社會生活還遠未形成新的規範，而是因為規範本身構成著社會生活本身，不是說先有了一種生活，然後再去尋求一種更清晰可行的組織規範，而是組織規範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生活的基本結構和要素。拉克里夫認為，疫情的社交隔離，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們借助具身性缺失的體驗，更明確地把握具身性對理解和體驗社會生活、理解和感受自我和世界的重要性。

然而，筆者希望針對這個現象提出以下兩條思路：首先，根據我們的經驗習慣，疫情期間的“線上”社會活動當然可以看作是對通常社會性聚集的一種缺失性模仿，是特殊時期不得已為之的替代物。但若換個角度，從人類社會生活本就總是處在變遷中的角度來看，線上社會活動是否可以看作互聯網技術發展的階段性產物，是一部分人際交往的更優替代，尤其是義務性、不太涉及個人的工作會議等？事實上，拉克里夫時隔近半年後發表的一篇媒體短文中，也提到建基於社交距離的社會生活似乎是在整體上便與之前的尋常生活有所不同的“另一個世界”。他使用“另一個世界”的表達時帶有明顯貶義，但貶義似乎並非是基於邏輯推理，而更多是情感性的，是對我們一直以來所習以為常的那種“在世界之中”的生活的懷念和眷戀。因為疫情，我們更多使用

且更加依賴互聯網線上功能，而線上社會生活的組織形式，很可能就是歷史規律的並非偶然的走向。與其說疫情帶來了它，不如說是疫情讓我們加速來到它。

第二、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僅互聯網技術發展迅猛，生物高新技術也在加速發展，身體本身也成了技術的物件和成果。比如基因編輯和腦機對接，前者意味著身體的生物醫學技術化，後者意味著身體的數位化和機器化，這兩種技術的倫理前提都是對於身體的不同於傳統思想的理解。身體不再是人們被給予的生物性前提，而是變成了人為選擇的結果；身體不再是與機器相對立的智慧載體，而是成為可以與機器相互溝通和轉化的潛在資料庫。這兩種意義重大的革命性技術，都催促著我們反思身體的含義和具身性概念的內涵。這個反思迫使我們超出傳統思想的一系列二元對立概念框架，在包括了生物醫學、人工智慧和認知科學等新型交叉學科在內的視閥裡，對身體及其社會性含義進行更加全景化和更加基礎性的轉化甚至重構。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漢斯 - 馬丁·薩斯：〈冠狀病毒不但襲擊個體，還襲擊政體與團體〉，
《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頁7-37。Sass,
Hans-Martin. "The Coronavirus also Attack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7.
- Carel, Havi, Matthew Ratcliffe & Tom Froese. "The Art of Medicine:
Reflecting on Experiences of Social Distancing," *The Lancet*, published
online, June 30, 2020. ([http://doi.org/10.1016/S0140-6736\(20\)31485-9](http://doi.org/10.1016/S0140-6736(20)31485-9))
- Kidd, Ian James & Matthew Ratcliffe. "Welcome to Covidworld," *The Critic*,
November, 2020. (<https://thecritic.co.uk/issues/november-2020/welcome-to-covidworld/>)